# **郑永年：中美贸易战中我们暴露了怎样的弱点？**

# 所谓的弱点就是从前被自己所忽视，但对国家的发展至为重要的领域。如果在知道了弱点之后，努力克服，亡羊补牢，无疑对国家的未来发展会起到正面的，甚至推动性的作用。

# 作者：郑永年（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 ​

# 在正进行中的中美贸易战，中国暴露了怎样的弱点？这是一个人们无法回避的问题，因为美国（和西方）看到了中国的弱点，就会利用其对中国变本加厉地加以打击。很显然，中国如果不能尽快克服这些弱点，那么就不仅输了这一轮竞争，今后的发展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 当然，因中美贸易战而暴露弱点也不全是坏处。所谓的弱点就是从前被自己所忽视，但对国家的发展至为重要的领域。如果在知道了弱点之后，努力克服，亡羊补牢，无疑对国家的未来发展会起到正面的，甚至推动性的作用。

# null

# 暴露的弱点无疑有很多，但至少包括如下几个大的领域。

# 第一，工业体系的脆弱性。如果借用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的话“人家（美国）一断芯片，你就休克了”来说，中国工业体系的脆弱性是显见的。

# 具体来说，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中国有速度，有“大而全”，但缺质量、附加值和原创。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中国速度”奇迹，20多年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不过，并没有出现中国质量和价值。工业体系呈现出“大而全”的局面，几乎什么都能生产，并且生产能量巨大，很多领域的产能位居世界第一或者第二。实际上，一些产品，如果中国开始生产，就轮不到其他国家了。在很多年里，人们普遍相信，珠三角足以加工和提供全世界所需的产品了。这也就是美国老说“中国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的原因。

# 除了少数几个领域，例如人工智能（AI）、超级电脑、航天、生物科技等，总体上说中国工业缺少核心技术，尤其是原创性技术。这就导致了中国的单向依附性经济体，即中国依附其他经济体，而不是相反。所谓的“加工业”就是为其他经济体加工，是对人家的技术的加工，是依附于人家的。这就造成一种“人家缺了你可以，但你缺了人家不行”的局面。

# null

# 1、若世界市场不存在，中国会怎样

# 缺少技术创新也意味着产业的附加值低。很多年里，很多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加工业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农民工廉价的劳动力和地方政府提供的廉价（甚至免费的）土地，技术因素对经济的贡献很有限。因此，劳动力和土地价格一变化，很多产业就开始面临危机了。

# 即使就技术的应用来说，产业界也存在着严峻的问题。如果把机械化界定为工业1.0版，自动化为2.0版，信息化为3.0版，智能化为4.0版，那么中国大多数企业仍然处于1.0版和2.0版之间，3.0版和4.0版也有，但大多是其他国家技术的应用。如果存在着容许技术自由流通的世界市场，那么企业可以从世界市场上获取技术，不断升级。但这里的危险在于，一旦出现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世界市场不存在了，中国的工业体系就会发生即刻的危机。

# 换句话说，如果发达国家不提供技术了，1.0版和2.0版的产业仍然可以自主地生存和发展，但使用3.0版和4.0版技术的企业就要“休克”了。互联网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很长时间里，人们总以为互联网是中美两家的技术。但实际上互联网技术只属于美国一家，因为中国的大多数互联网技术只是美国技术的应用。如果美国真的中断互联网技术供应，中国就可能会回到“内联网”时代。

# 在国际经济领域也存在着企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国际市场的主体是企业，所以企业必须遵守和服从市场规则，否则就会受到惩罚。一些中国企业（也有一些地方政府）要求西方企业进行技术转让，以市场换技术。而另一些企业（例如中兴）尽管从国际市场上获得了技术等利益，但并没有遵守市场规则。

# 但实际上，中国企业的选择是有限的：要不企业本身有能力创造，无需依赖国际市场；要不服从国际市场规则，从国际市场获得技术。企业国内不守市场规则的行为一旦延伸到国际市场，肯定要出问题。对这一点，西方政府和企业看得很清楚，他们现在也知道如何来对付中国企业了。

# 第二，对国际层面的事物发展缺乏预判能力。贸易战绝非新鲜，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也必然会发生在中美两国之间。但很长时间以来，大多数人都相信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不可想象。美国学者提出了“G2论”，或者经济上的“中美国”，中国学者相信“夫妻论”。两者的依据是一样的，即中美两国之间贸易依存度高。不过，实际上历史经验已经表明，高贸易依存度不仅不能避免贸易战，反而会促成贸易战，取决于进出口是否平衡。

#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依存度，并不比今天中美两国的低，但最终欧洲国家之间还是发生了战争，并且是热战。上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与德国和日本之间也发生了贸易战，而德国和日本还是美国的同盟，安全上完全被美国所整合。中国和美国既缺乏欧洲国家之间那样拥有共同的文化和价值观，也缺乏美国与德、日之间那样的同盟关系，因此贸易战几乎是必然的，尽管贸易战对双方都会造成伤害。

# 基于简单而乐观的假设，中国对贸易战没有做任何准备。直到贸易战来了，人们还不敢相信，认为只有特朗普这样的“疯子”才会这样做。这种认知更没有驱使有关方面去认真解决中美贸易逆差的问题。

# null

# 尽管多年来，中国也一直表示不以追求贸易顺差为目的，但在政策层面的确缺失有效性。中美双方的贸易不平衡也并非是中国的原因，更多的是美国的原因，因为美国不愿意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但不管是谁的原因，巨大的贸易逆差都必须解决，如果得不到解决，肯定要发生严重的后果。

# 第三，对事物的本质缺少判断能力。很长时间以来，在外交政策上盛行“经济决定论”，一切为了经济，考虑问题也基本上过分强调单向面的经济要素。就贸易战而言，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贸易战仅仅是经济问题吗？很多人停留在经济思维，仅仅从经济上来理解贸易战。理性地说，贸易战发生了，如果能够把此局限在经济领域自然是最理想的，人们也不能用其他手段来解决贸易战。但如果不能考虑到贸易战的外部影响，就会判断失误。就这次贸易战而言，一些人对中美关系演变的本质缺乏正确的判断。

# 贸易战仅仅是其中一种体现方式（或者特朗普方式），如果没有贸易战，也会以其他方式体现出来（例如在南海、台湾、朝鲜半岛等问题上）。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就需要全面的调整；调整好了，就可以维持和平；调整不好，就会发生冲突。这也是历史所证明的，即人们所说的“修昔底德陷阱”。

# 第四，最为重要的是暴露了社会反应的脆弱性。对内部来说，社会的反应是最为关键的。概括地说，对中美贸易战中国社会的反应表现为两个极端。在一个极端，一些人支持美国的贸易战，幻想来自美国的外在的压力少则促成政府降低进口关税，多则促成内部的进一步改革。

# 特朗普在中国可能要比在美国更受欢迎。直到今天，特朗普和美国的主流社会（尤其是媒体）一直处于对峙状态；在中国则不然，一些人对特朗普的政策抱有过多的幻想。就贸易战而言，历史地看，外在的压力从来没有促成内部更好地发展，这从德国和日本的例子可以看到。

# null

# 2、“恐惧感”促使西方对华政策改变

# 中国并不想打贸易战，贸易战也不是中国所发起。不过，借用一位西方外交官的话来说，是中国的一些人“唤醒了中国在西方的敌人”。这里的“唤醒”主要指一段时间以来，有关方面的“过度宣传”，结果大大超越了政策设计者的初衷。

# 这主要表现在三个领域，即“中国制造2025”“一带一路”和“中国模式”。“中国制造2025”实际上仅仅是中国本身产业可持续发展所需，就如德国的工业4.0项目一样，但对很多学者和政策研究者来说，这是为了超越美国和西方的项目。“一带一路”在高层看来仅仅是中国的发展“倡议”，并且多次强调，“一带一路”尽管是中国的倡议，但发展机会是属于大家的，利益是大家共享的。

# 至于“中国模式”，通过近代以来的探索，中国的确形成了“中国模式”，但“中国模式”和其他模式不存在必然的冲突，而更多的是互补。尽管中国也强调“中国模式”为人类提供了另外一个可能性的选择，但同时强调不会输出模式。但对一些学者和政策研究者来说，“中国模式”的目标就是要打败西方模式。这种过度的宣传和解读无疑给西方制造了一种“恐惧”，莫名其妙地感到西方要被中国所超越、所取代，而这种“恐惧感”又促成美国（和西方）改变其对华政策。

# 不管如何，现在中国的“敌人”已被唤醒，并且从各个方面开始向中国发难，对中国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不过，这里的问题是，这场贸易战能够唤醒中国本身吗？如果只唤醒了“敌人”而不能“唤醒”自己，未来的前景只有更坏，没有最坏。但如果在唤醒“敌人”的同时也“唤醒”了自己，便是进步的动力。

# null

# 和美国（西方）的冲突迟早会到来，关键在于如何应对。中国所需要的既非像一些人那样毫无自信而“乞求”外力，更非像另一些人那样盲目自大而走向“义和团主义”，而是在摸清楚自己的家底之后，理性应对贸易战；在这个基础之上发挥自己在一些技术领域的优势，并在更多的领域抓紧补课，踏踏实实地求进步。

#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可持续发展和进步，而非超越和打败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的大国，只要自己不打败自己，就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打败中国。

# **梳理中美贸易战原因分析及经过**

一、中美贸易战原因分析

1、美国有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传统。美国建国后，通过的第一个法案是美国国徽，第二个法案便是贸易保护法案，即1789年通过的《美国关税法》。美国人骨子里流淌着贸易保护的血液，认为通过贸易保护可以保证本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这和美国曾经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历史有着一定的关联，未独立前的美国不得已与英国进行贸易往来，而这种贸易大多是一种不公平交易，所以美国人会在骨子里认同通过对外来产品的高额关税，来对本国贸易进行保护。

2、美国国民经济去虚向实的需要。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资本管制放松，金融资本主义引发的“去工业化”，导致美国老工业区面临破产，失业率倍增，形成了规模庞大的“铁锈带”。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比例已连续65年呈下降趋势，从1953年的32%降至2017年的8.5%。目前，美国最富有的1%人群占有全国财富的38%，最贫穷的40%人群则仅占有全国财富的1%，整个国家中产阶级下层化等社会问题持续得不到解决，美国社会已接近“掠食者国家”。在许多美国民众看来，美国力推的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非但没有使美国经济状况更好，反而出现了贸易赤字增加、制造业流失、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问题，因此美国的中下层民众（特别是白人）普遍反感经济全球化进程，渴望重新借助贸易保护主义实行自强，实现美国国民经济的“再工业化”。

3、遏制中国制造发展的需要。2014年，中国开始提出《中国制造2025计划》，明确了在十个领域加大投入研发力度，涵盖信息技术、数控和机器人、航天航空制造、海洋工程装备、新材料、节能和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和高性能医疗器械、先进轨道装备等，从中美贸易征收关税的名单来看，前期主要涵盖的是这十大领域的产品，以此来遏制中国相关产品的出口，进而遏制相关产业的发展。

4、扰乱其它经济体，配合美元加息，加速美元回流。美联储退出QE量化宽松政策，且有进一步加息的计划，随着加息的推进，美元有回流趋势，加之贸易战，可以强化企业对美国经济的信心。

5、迎合美国国内民粹情绪，兑现竞选时许诺。2016年特朗普上台前，其竞选的口号中有两句很有典型性，一句话是：美国第一，即所谓的美国优先原则。另一句话是把制造业带回来。通过贸易战，发展国内工业体系，真正实现美国利益至上的信条，把旧有的美国工业体系再度振兴起来。

6、贸易战的运用得心应手。从近现代史来看，无论是前苏联和二战后的日本都曾经遭遇过美国的贸易战，且都是在经济体量达到美国体量2/3左右时发起的。对前苏联的贸易战是通过打压国际油价，使得当时国际油价一度跌倒9美元一桶，这对资源依赖型的苏联来说打击巨大。对日本则是通过301调查，即所谓知识产权调查的保护，逼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最终导致了日本货币快速升值，国内泡沫增大，最终导致日本房价崩盘，日本经济陷入了20余年的泥沼，长期发展停滞。

二、中美贸易战过程

1、贸易摩擦

2018年1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进口大型洗衣机和光伏产品分别采取为期4年和3年的全球保障措施，并分别征收最高税率达30%和50%的关税”。

2018年2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对进口中国的铸铁污水管道配件征收109.95%的反倾销关税”。

2018年2月27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铝箔产品厂商征收48.64%至106.09%的反倾销税，以及17.14%至80.97%的反补贴税”。

2018年3月9日，特朗普正式签署关税法令，“对进口钢铁和铝分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

2、升级贸易战

2018年3月22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因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对中国商品征收500亿美元关税，并实施投资限制”。

2018年4月4日，美国政府布了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将对我输美的1333项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美方这一措施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严重侵犯我国合法权益，威胁我国家发展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相关规定，经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加征25%的关税。实施日期将视美国政府对我商品加征关税实施情况，由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另行公布。

2018年4月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依据“301调查”，额外对1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这一做法严重违反国际贸易规则。

2018年4月17日，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宣布，对产自中国的钢制轮毂产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即“双反”调查）；美商务部还初裁从中国进口的通用铝合金板存在补贴行为。

2018年5月29日，美国白宫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含有“重要工业技术”的500亿美元商品征收25%的关税。其中包括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相关的商品。最终的进口商品清单将于2018年6月15日公布，并很快对这些进口产品征收关税。

2018年6月15日，美国政府发布了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对约340亿美元商品自2018年7月6日起实施加征关税措施，同时对约16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开始征求公众意见。

2018年7月6日00:01（北京时间6日12:01），美国开始对第一批清单上818个类别、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作为反击，中国也于同日对同等规模的美国产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

2018年7月10日，美国政府公布进一步对华加征关税清单，拟对约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加征10%的关税，其中包括海产品、农产品、水果、日用品等项目。这一轮关税措施将经公众评论，并在8月20日至23日举行听证会。美国政府将在8月30日公共评论结束后决定下一步行动。

2018年8月2日，美国贸易代表声明称拟将加征税率由10%提高至25%。

2018年8月8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布第二批对价值16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清单，8月23日起生效。最终清单包含了2018年6月15日公布的284个关税项目中的279个，包括摩托车、蒸汽轮机等产品，将征收25%关税。

3、中兴小插曲

2018年4月16日晚，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美国政府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

2018年5月，中兴通讯公告称，受拒绝令影响，本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已无法进行。 5月22日，美国将取消中兴通讯销售禁令，根据讨论的协议维持其业务。

2018年6月7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美国政府与中兴通讯已经达成协议，只要后者再次缴纳10亿美元罚金，并改组董事会，即可解除相关禁令。 6月19日，美国参议院以85-10的投票结果通过恢复中兴通讯销售禁令法案。

中兴被制裁是因为触犯了美国针对伊朗的出口管制的限制条款，与多边贸易体制关系不大，与中美贸易战有着本质的区别。

中美贸易战的原因、现状及趋势和中国对策研究

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自1979年中美建交和签署双边贸易协定以来，两国贸易发展迅速，但也存在着不断的摩擦。特别是自特朗普2016年当选美国总统以来，美国以美中贸易逆差巨大为由对中国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引发了两国贸易摩擦。[1]

　　2018年5月初，美国代表团与中国举行了第一轮经贸谈判。尽管“进行了坦率、高效和建设性的讨论”，但在某些问题上仍存在很大分歧[2]。2018年5月中旬，中国代表团与美国举行了第二轮经贸谈判，发表了《中美经贸磋商联合声明》，双方停止了互相加征关税，以避免贸易摩擦升级，中美经贸关系似乎正从正面冲突转向长期谈判[3]。

　　2018年6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无视中美双方的共识，批准对约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关税，并于6月18日威胁中国。如果中国继续反击，将对2000亿中国商品征收10%的关税。对此，中国表示，如果美国继续坚持，就必须采取“量与质相结合”的综合措施加以应对，双方在以往谈判中取得的所有经贸成果将不再有效。7月6日，美国正式对第一批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货物征收25%的关税。作为一种反攻，中国在同一天采取了同样规模和强度的税收措施，并针对美国根据“301”调查正式实施的税收措施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提起了额外的起诉。到目前为止，中美贸易摩擦已正式升级为贸易战。7月10日，美国公布了中国2000亿美元进口商品10%关税加征的详细清单。此外，8月3日，美国表示将对20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作为一种对策，中国对其6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征收了四种税率不同的关税。到目前为止，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国和中国在当前敏感的国际形势下发动贸易战必有深层次的原因。探索这场贸易战的背景，不仅可以更清晰地阐明中美贸易的发展现状，而且可以为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对贸易风险提供启示。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外研究现状

　　由于中美贸易战正式开始的时间是2018年7月，在之之前中美之间是贸易摩擦，因此国外关于中美贸易战的研究不多，而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美贸易摩擦演进趋势、影响因素、政府干预等方面。

　　中美贸易摩擦领域不断扩大。Wayne M Morrison[4]认为对于美国来讲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之一，这对美国的经济发展构成强大威胁。中美贸易摩擦领域将进一步扩大至高科技产业、制造业、劳动密集业等方面，涉及的种类也会增多。Francis Tanczos[5]指出中美贸易就是一场不公平的游戏，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在这种局势下，美国也出于维护自身贸易利益而采取了反倾销反补贴措施，尤其表现在对新鲜大蒜、蘑菇罐头等产品进口加强的贸易管制。Gary Clyde Hufbauer等[6]列举了近些年中美在贸易上的摩擦实例，自2004年中美在集成电路上的谈判开始，中美贸易摩擦涉及到出版书籍、金融业、汽车、家禽类、房地产等各方各面。

　　区域组织潜在影响中美贸易关系。Peter A petr等[7]研究表明，中美贸易关系受到了区域组织、贸易模式、生产技术、因素供应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政府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干预程度正在加强。Peter Goodings Swartz[8]指出近些年美国政府频频出招，贸易保护主义横行。美国政府公然提高关税、制定高标准的进口准则阻止对我国产品的进口。Daniel Ikenson[9]认为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是十分糟糕的行为，必然会加剧中美两国的紧张关系，这对于双方贸易的发展都十分不利。

　　汇率的工具性日益凸显。美国政府在中国的汇率问题上也大肆干涉，WingThye Woo[10]指出中国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汇率政策方面，美国政府认为人民币的升值会是拯救美国经济的灵丹妙药。Peter Goodings Swartz[11]指出如果人民币贬值那么中国的商品将像洪水一样冲垮美国的商品市场。Gary Clyde Hufbauer等[12]指出人民币升值是潜在催化剂，升值问题可以促使中国用更少的钱进口更多的美国产品，将会影响两国外汇储备，因此中美两国的政策制定者一定要明智的做出选择。

　　综上所述，外国学者指出，中美贸易摩擦正在扩大，涉及的产品种类不断增多。同时，区域组织、政府干预和汇率将成为影响中美贸易关系发展的因素。然而，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现状和原因没有任何解释，对中美贸易摩擦升级所引发的贸易战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

　　1.2.2 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关于中美贸易战的研究，主要对中美贸易战对一些行业领域的影响进行研究，如胡静指出中美贸易战或给航运业带来利好[13]；金洁颖，华晶则以农产品进口为例，研究了2018中美贸易战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文章通过分析2018中美贸易战产生的背景，以及农产品对两国经济主要是我国的影响，提出了精准有限还击，以打促和，扩大开放，争取国际支持，以及消除误解，加强中美经贸“双赢”宣传的应对贸易战的措施旨在避免对我国经济产生波动。[14]

　　熊婧涵研究了中美贸易战对纺织业的影响及对策，该学者认为中美贸易战对中方纺织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1）出口成本增加，竞争优势降低，（2）纺织品配额限制，还指出中国需（1）调整产业格局，提升竞争地位，（2）树立信心审慎应对。[15]类似的研究则有，梁岩等探讨了中美贸易战背景下纺企如何应对“337 调查”，一是增强企业知识产权意识，持续创新，二是积极应诉，三是抱团应讼，分摊成本，四是选择适当时机寻求和解，五是选择最佳律师团队，六是主动发起“337 调查”。[16]

　　除此之外，谢亚轩，刘亚欣研究了从贸易结构视角看中美贸易战[17]；黄正阳探讨了中美贸易战背景下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冲击和短板，即部分行业受到冲击不可避免，转型升级压力不断加大，海外市场布局急需调整，银行业支持力度亟待加强，据此提出了应对策略和政策建议，一是政府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二是企业转型升级，完善布局，三是银行丰富产品，提升服务。[18]

　　梅新育对中美贸易战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该学者指出，多年来，就总体而言，其它条件相同，出口部门、出口企业收益状况优于仅面向国内市场的同行，收入稳定性也相对较佳，因为前者可以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利用其经济周期不同步“熨平”收入波动。相应地，出口部门、出口企业就业者收入状况也优于仅面向国内市场的同行。在这种情况下，规模巨大的中美贸易战必然会对中国劳动力市场产生一定影响。[19]

　　张可云指出，中央、地方与企业共同推动建立国家区域企业三位一体有为的自主创新体系，是理性应对中美贸易战的必然选择。治疗“芯痛”还需要中央、地方与企业有所不为，避免陷入重复建设与政企不分等误区。理性选择自主创新方向必然要求中央、地方与企业三个层面有所为有所不为，审慎抉择并协调行动。[20]

　　综上可见，目前国内主要对中美贸易战的影响进行分析，而关于中美贸易战的背景、原因、本质等的研究较少有研究涉及，只有明晰了中美贸易战的背景、原因、本质等才能更好的应对美国发起的贸易冲击与挑战。

　　1.3 研究内容及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研究内容主要分为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分析了研究背景及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内容及方法。第二部分是理论基础，主要介绍了贸易摩擦和贸易战的概念，同时介绍了相关的理论。第三部分论述了中美贸易战的历史背景、原因及本质。第四部分论述了中美贸易战的现状及对中美双方的影响。第五部分提出了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战的策略。第六部分是结论与展望。

　　1.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文献资料法。通过查找、阅读、筛选、研究大量的文献资料，首先对所掌握资料进行文献综述的梳理。并立足马克思国际分工理论等，对中美贸易战进行研究。

　　第二章 理论基础

　　2.1 相关概念界定

　　2.1.1 贸易摩擦

　　一种国家之间正常的贸易冲突还未演变为贸易战争的平衡状态即贸易摩擦，是主要以技术性贸易壁垒、保障措施、反补贴、反倾销来对在各个领域本国军事、经济、政治利益所形成的纠纷和矛盾加以维护。

　　2.1.2 贸易战

　　当贸易不平等出现在两国之间时，为了对自身利益加以维护，贸易顺逆差国采取反倾销、提升关税等手段来制裁他国的行为便是所谓的“贸易战”。

　　2.2 本文的理论

　　2.2.1 马克思国际分工理论

　　国际分工是社会劳动与物质生产互动的必然结果。马克思指出：“一个国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最明显表现是该国劳动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仅是现有生产力的扩大，均会导致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相辅相成、相互推动，并且两者有着唇亡齿寒的密切关系。

　　首先，国际分工导致了国际贸易。逻辑上讲，生产是第一性的，交换是第二性的，生产决定分配。根据优胜劣汰的原则，国际分工决定了国际贸易的流向，即世界各国都在出口自己的优势产品。

　　第二，国际分工模式决定了国际贸易的结构。一个国家生产一种以上商品，与许多国家同时生产一种商品的优势和产业是不同的。一个国家生产一种以上的商品往往是一些初级产品和一些简单的工业制成品，而许多国家完成的商品通常是垂直分工的工业制成品，这有一定的困难。

　　第三，国际分工格局决定了国际贸易利益的流动。如果中国为美国加工高端电子产品，由于缺乏核心技术，中国只能得到少量的加工费，但美国已经用中国的制成品换来财富，从而凸显了知识产权的重要性。

　　当然，国际贸易也反作用于国际分工。各国为了加大本国优势产品的生产必然会投入更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这就进一步深化了国际分工。

　　2.2.2 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提出国际价值的概念：“在同一劳动时间内，不同国家所生产的同样商品的不同量，国际价值是不同的，价格亦不同，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货币额。”

　　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国际价值的实体依旧是劳动。在商品进入世界市场之前，不同生产者的劳动转化为商品的国内价值，在该商品进入到世界市场之后，国内的社会必要劳动转化为国际必要劳动，商品的国内价值也随之转化为国际价值。

　　是由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决定商品的国际价值的，即由在世界经济现有条件下，在各国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和强度下，生产某种商品所需要的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的二重性是众所周知的重要理论，对外贸易的发展带来了世界市场的形成。此时，货币也将发展成为世界货币，抽象劳动发展成为社会劳动。价值规律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价值规律表现为：商品的国际价格围绕着国际价值上下波动。国际价格时而大于国际价值，时而低于国际价值，在一定幅度内这种波动现象是正常的。国际贸易的交换必须遵循这一规律，这种规律维持着各国国际贸易的平衡与和平。

　　2.2.3 马克思世界市场理论

　　世界市场是国家商品市场发展到一定范围和程度所形成的市场。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是国际流通的一个因素，是国内市场打破国界的延伸，是世界各国通过建立经济合作关系所建立起来的领域。马克思认为世界市场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整体和总和，资产阶级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在世界范围内寻找资源并进行开发。

　　世界市场与国际贸易的发展息息相关。一方面，世界市场的形成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国际贸易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合理配置世界资源可以优化商品生产率，最大限度地调节商品供给，大大缓解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

　　另一方面，世界市场中的各个国家具有联动效应，一国的经济危机可以影响到各个国家，因此当经济危机发生时，其波及范围也是空前的。

　　世界市场中，国际贸易起着传导机制的作用。首先，国际贸易传导了国内生产总值的扩张和收缩。其次，在世界市场中，国际贸易作为媒介传导了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

　　2.2.4 马克思国际贸易保护理论

　　贸易保护政策是一个国家采取各种措施限制进出口产品，以避免外国产品和服务对本国市场的影响。保护政策的实施是人为地保护国家生产力发展的行为。在马克思时代，保护的基本措施主要是超保护贸易政策、关税、重商主义等保护政策。

　　马克思认为，最重要的贸易保护政策是关税保护政策。关税保护政策将资本利益作为国家和国家发展和维护的利益。马克思认为，“关税保护制度是将国家生产、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缩短从旧的生产方式向现代暴力生产方式转变的人为手段。”

　　当然，马克思认为保护性关税政策也有其积极的一面。这一政策有利于幼稚产业的发展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这也是凝聚自身力量，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一种手段。一般来说，保护性关税政策是一种保守的制度。对外贸易是现代生产方式正常运行的外部条件。过高的保护关税不利于国内企业生产力的发展和竞争力的提高。因此，保护性关税政策应适度，因地制宜。

　　第三章 中美贸易战的历史背景、原因及本质

　　3.1 中美贸易战的历史背景

　　从19世纪末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角度看，中美贸易摩擦的爆发演变为一场贸易战。它反映了帝国主义的美国作为世界第一超级大国，阻止和抑制社会主义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迅速崛起。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世界第二名是困难的。19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英国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一。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战败，在美国和英国的倡议下，形成了两个主要的国际经济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然后是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ATT）的签订，美国最终成为全球经济规则制定方面的世界领先者，世界上最大的力量，但在此之前它已经潜伏了50年之久。之后，又经过一段时间先后打败社会主义苏联及日本才得以维持自己的霸主地位。

　　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对外开放不断扩大。1978年，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1992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国际经济地位不断提高。2010年，中国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在世界排名第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这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世界第一超级大国美国的高度警惕。为了维护世界第一霸权，难怪美国采取行动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虽然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规模的有效指标之一，但它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最佳指标。目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不到美国的1/6。虽然我国制造业规模大，但实际技术水平不高，经济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比重低，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改变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发展模式。经济规模不等于硬实力，近年来，中国大力推进产业升级，实施工业4.0规划，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增强中国硬实力，实现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

　　美国担心中国的产业升级将导致与自身的直接战略竞争，这将影响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如果失去这一优势，美国的全球霸权将受到严重挑战。因此，美国引发的贸易摩擦主要集中在中国正在进行产业升级的中高端产品上。不仅如此，美国还试图遏制中国的技术进步，例如通过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贸易和投资法规，以及类似于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对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实施的单边审查工具，限制中国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发展。在美国贸易代表处（USTR）公布的1300多个独立关税项目中，几乎所有涉及的行业都集中在“中国制造2025”支持的行业中。事实上，这些行业在中国对美国出口中所占比例很小。因此，美国在贸易保护的旗帜下明确打压“中国制造2025”的战略目标，足以体现美国的霸权思想。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美经贸关系逐步从互补型向全球战略竞争型发展。一个是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守城大国，另一个是迅速崛起的社会主义新兴力量。两国未来将面临全球战略竞争，无论是在经济、地缘政治、军事还是文化方面。可以预见，未来，在数据分析和高超音速等战略领域，快速发展的中国企业必将继续受到美国的制约。

　　3.2 中美贸易战的原因

　　美国以对华货物贸易逆差为由挑起的贸易摩擦和开打的贸易战，可能会使一些人得出货物贸易巨大差额是中美贸易战的起因的结论。但研究表明，货物贸易巨大差额不是中美贸易战的起因。其根本原因是世界霸主老牌帝国主义美国对迅速崛起的社会主义中国持有戒心，并对中国至关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战略压制。

　　那么，美国对华货物贸易巨额逆差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美中货物贸易逆差是否真的如美国统计的那么高？主要原因如下：

　　3.2.1 美国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控制加大了美中货物贸易逆差

　　美国认为，美中货物贸易巨额逆差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奖出限入政策和外汇倾销。这种指责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在贸易政策上，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指责中国通过设定高进口关税和对出口行业进行非法补贴获得不公平的贸易利益。据世界银行统计，2017年一年美国对华贸易争端立案总数从2016年的44起增加到51起，创下历史新高；2018年5月中美第一次贸易谈判中，美国要求中国减少2000亿美元的对美贸易逆差，并停止对“中国制造2025”的补贴和其他形式的政府支持；7月20日特朗普宣称要将征税范围进一步扩大至5000亿美元，几乎覆盖了中国出口至美国的全部商品。然而，美国对中国的指责是不合理和不公平的，因为美国、欧盟和日本政府也曾经大量补贴各自国内弱势或新兴产业以促进其发展，这些发达国家通过政府补贴并在一些行业中取得绝对优势之后却不允许后发国家也进行相关补贴，这是对后者的不公平；且美国在指责中国的同时，仍在通过各种直接和间接的政府补贴促进农业、汽车等产业的生产和出口[21]。此外，中美两国处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存在不同的资源禀赋和产业结构，所以在不同产品的进口关税上存在一定差异并不违反WTO的相关规定，美国以汽车行业为例指责中国关税过高的说法是以偏概全。

　　在汇率政策上，美国曾一度指责中国通过削弱人民币汇率来促进出口。实际上，人民币汇率虽然对中国出口贸易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并不大。世界银行统计的统计表明，从历史上看，1994年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是1：8.7，而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很小，仅为294.9亿美元；到2017年为1：6.6左右[22]，而货物贸易逆差升至3752亿美元。此外，虽然人民币汇率在2014-2016年期间出现阶段性贬值，但这与谋取额外贸易利益无关，因为相较于前一年，中国外汇储备在2015年和2016年分别下降了5126亿美元和3199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若中国有意操纵人民币贬值显然不利于稳定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有违“汇率操纵”论断。

　　美中货物贸易巨额逆差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对华的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控制[23]。中国在中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领域具有比较优势，而美国在高新技术领域具有更强的比较优势，中美贸易结构由此决定。但1949年以来，美国控制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华一直实行歧视性出口管制政策[24]。反之，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进口高新技术产品，中国顺势而动，将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对美国出口不断扩大；而美国逆势而为，将自身具有竞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品进行出口管制，直至今日也并未放松。如果美国不对出口到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实行管制，则可以大幅度降低美国对华货物贸易逆差。

　　3.2.2 用原产地原则的统计方法和转口贸易高估了美中货物贸易逆差

　　基于现行的原产地原则的货物贸易统计方法实际上夸大了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25]。

　　在生产高度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通过加工组装的方式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虽然中国所获得的利益仅为价值链中加工组装环节的增加值，但当前的原产地原则的贸易统计方法却把总的商品价值记为中国的出口额，这一统计方法的滞后直接导致了美国对中国的货物贸易逆差被夸大。

　　转口贸易是生产国和消费国不直接进行而通过第三方进行的贸易，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货物贸易额的统计中，转口贸易从两个方面高估了此数据：一方面，美国官方将中国香港的转口贸易额笼统地计入中美贸易总额，但实际上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中国并非这些货物的真正出口国；另一方面，在统计美国对中国的进出口时，美国官方按离岸价格计算出口金额，而按到岸价格计算进口金额，这使得装卸、运输和保险等费用被双倍计入了当前统计的中美货物贸易逆差[26]。此外，在美国对中国出口货物贸易额的统计中，并未将通过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以转口贸易形式间接卖给中国的商品计算进去，这样一进一出，大大高估了美中货物贸易逆差。

　　3.2.3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贸易转移效应扩大了美中货物贸易逆差

　　外商直接投资（FDI）会产生贸易转移效应，把FDI母国对第三国的货物贸易顺差转移成东道国对FDI母国的货物贸易逆差和东道国对第三国的货物贸易顺差[25]。

　　改革开放以来，日本、韩国等地区不断把一些劳动密集的出口加工贸易型产业转移到中国大陆地区，这些外资企业从母国或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生产设备、原材料、中间品或关键零部件，在中国大陆地区进行加工制作，然后将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出口到美国。实际上这是外资企业母国对美国的出口，但是在进出口统计中却全部被计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总之，用当前方法统计的美中货物贸易逆差数额来评价中美货物贸易的利益得失是不科学且有失公平的。

　　3.2.4 “净误差与遗漏”夸大了美中货物贸易逆差

　　作为国际收支平衡表的抵消账户，“净误差与遗漏”在统计上应该具有显著的随机性，如果其存在阶段性特征，例如方向的阶段性维持，则说明其有特殊的经济含义；同时，根据国际惯例，“净误差与遗漏”的规模占同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应该在正负5%以内，否则平衡表就是不可靠的[27]。据世界银行统计，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净误差与遗漏”从2014年第二季度开始到2017年第四季度一直为负值，且在2017年，中国“净误差与遗漏”占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比重为5.6%，说明可能存在经常项目顺差被高估，或者对外资本输出被低估的情况。导致中国“净误差与遗漏”项长期为负且规模巨大的经济原因除了可能出现资本外逃，还有可能是企业虚报出口。

　　由此可见，美国总统特朗普以美中货物贸易巨额逆差为由对中国进行的指控与事实不符，美国基于不符合时代要求的货物贸易统计方法计算得出美国对中国存在高额货物贸易逆差，并以此为借口来攻击中国的贸易、产业、汇率以及知识产权制度或政策，使两国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其真实意图在于阻挠和遏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3.3 中美贸易战的本质

　　美国围堵中国，扼制中国的崛起，意在继续主导世界经济的发展，防止中国对美国霸权的染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美国在挑起贸易战的同时，已在经济、政治、军事、地缘政治和文化上对中国进行了全面施压、围堵和遏制。

　　3.3.1 美国在经济领域施压中国

　　在经济上，美国采取组合拳，从贸易、金融和投资三个方面向中国全面施加压力。

　　在贸易方面，美国以中美货物贸易长期保持巨额逆差、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和中国不遵守WTO承诺为由，2018年7月6日正式对34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发动了中美经济史上规模最大的贸易战；同时为坚定美国中西部农业洲支持贸易战的信念，美国白宫竟通过了高达120亿美元的补贴计划以帮助可能在贸易战中受损的豆农。

　　在金融方面，美国意图通过加息缩表吸引全球资本特别是在华外资企业资本流向美国市场，引发人民币的汇率风险；若中国守不住相对固定的人民币汇率，则容易触发中国金融危机。虽然中国可以通过外汇储备等方式进行有效防范，但是若美元储备不足也容易给中国带来金融风险，美国这一行为无疑会对中国接下来的货币政策产生巨大压力。

　　在投资方面，美国政府采取的税制改革，不仅涉及范围广、金额大，关键是要把原先全球征税体系转变为属地征税体系，其主要目的是引导资本回流美国，促使美国就业和收入增加。近10年来，中国统一内外资所得税率，中资企业快速发展，中国政府也加大了对中资企业的支持力度；相应地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上的优惠待遇不断削弱，中资企业在人才和市场等方面对外资企业构成了威胁。美国在华企业愈发感到焦虑和不满，这种不满情绪会很快传至美国媒体和政界，对中国执行产业政策手段的指责、“301”报告的出台以及拟限制中国赴美投资政策均是这种不满情绪的宣泄。

　　3.3.2 美国在政治同盟上挤压中国

　　在价值取向上，美国与日本、欧盟等形成同盟，至今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尤其是在亚太地区，日本和韩国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国，在特朗普上台之初就与之进行密集高层接触。如越南和菲律宾因南海问题一直以来与中国摩擦不断，因此特朗普对这两个国家给予了高度重视，不但亚洲之行中特意访问了越南和菲律宾，还多次提及“印太”概念，企图拉拢两国与之形成同盟，至此特朗普的亚洲战略开始加速成型。

　　为了推进并实现这一战略，特朗普联合日本和澳大利亚达成了在印太区域深化安全与战略合作的共识，并引诱印度加入并支持“印太战略”形成四国联盟，以达到制衡中国的目的。对于亚洲以外的盟友国，特朗普也并未放弃拉拢，并已取得一定成效。虽然特朗普的贸易制裁枪口也指向了欧盟、加拿大等盟友国，但是我们更倾向于认为这是美国逼迫这些国家明确站队，用强硬手段要求其盟友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与其统一战线。

　　3.3.3 美国在军事领域挑战中国

　　在军事上，美国插手中国的南海问题和台湾问题。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扩大势必导致中美双方的军事对立。2018年1月9日，美国发布的《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对手，并认为“中国使用经济手段来恐吓邻国，并且军事化南海地区”。随后在2月3日发布的《核态势审议报告》中点名中国与美国削减核武器的行为背道而驰。可知，美国的遏华战略已从温和型转向攻击型。

　　同时，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岛礁军事化、破坏航行自由和危害地区秩序的指责不绝于耳，打着航行自由行动的旗号实施挑衅之实。事实上，美国才是岛礁军事化和危害地区秩序的始作俑者。

　　在中国台湾问题上，美国先是不断违反“一中原则”，仅2018年3月至5月期间就通过了5个涉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法案，分别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等方面挑拨中国台湾与大陆内地的关系；随后便是有计划地派遣军舰穿过中国台湾海峡，并策划参加中国台湾地区军演，军舰穿台海计划在2018年7月7日得到实施，其他军事干涉也会接踵而至。这一系列行为背后是对中国底线的挑战。

　　3.3.4 美国在地缘政治上围堵中国

　　在地缘政治上，美国推行“印太战略”，对中国形成“C”形包围圈，并在外交上对中国进行遏制和围堵。首先，美国对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进行打击，包括把巴基斯坦归为隐藏恐怖分子的国家，并暂停对巴基斯坦的各类援助。其次，美国还频频围绕中国周边地区进行外交活动。

　　在外交上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从美国的一系列举动不难看出其围堵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意图。

　　3.3.5 美国在文化领域侵略中国

　　在文化上，美国宣传的普世价值观与中国的四个自信及核心价值观产生冲突。普世价值观属于资本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宣扬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等；它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基础，认为个人价值高于社会价值，体现了极端的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想。在实践过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着普世价值的幌子对非西方国家实行侵略和掠夺，导致相关国家政治动荡、经济衰退、社会混乱，给当地人民带来了灾难。这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显然对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中国不具有“普世”性。而中国奉行的四个自信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扬“社会本位”的价值观，更符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国情。如果把适合美国发展的普世价值观削足适履地套用到中国，必然会阻碍中华民族伟人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在美国最新一版的作为指导美国国防安全与军事战略走向的纲领性文件《国防战略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美国对中国的定位已发生转变，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点已经从恐怖主义转变为国家间战略竞争[28]。

　　第四章 中美贸易战的现状及危害

　　4.1 中美贸易战的现状

　　中美贸易战不但涉及金额巨大，而且涉及产品种类不断扩大，手段也日益多样化。

　　4.1.1 涉及金额巨大

　　自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商品规模，从第一轮的500亿美元，到第二轮征税的2000亿美元。

　　而中国对美国加征关税商品规模，第二轮征税为600亿美元。

　　4.1.2 涉及产品种类不断翻新

　　自中美贸易战以来，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商品，已从高端制造向日用消费品扩展。具体来说，美国第一轮的征税范围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电子设备、运输设备、医药等高端制造业。到了第二轮征税，征税范围显著扩大。从美方公布的清单看，征税范围涉及6048项HS八位数商品，覆盖绝大部分HS两位数子行业，其中化工品、纺织品以及金属制品占HS八位数最多，占比分别为23.7%、15.4%和12.1%。由此可见，高端制造继续成为美国第二轮征税的主要对象，化工品、塑料制品、金属制品等消费品也全面进入征税范围。

　　经过两轮加征关税，机电、音像设备纳入美方加征关税范围，占中国对美该类商品出口比重达63.6%；日用消费品中，纳入征税范围的家具、寝具、灯具等杂项制品出口占比52.4%。

　　图4-1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商品目录

　　图片：来源于网络

　　4.1.3 手段日益多样化

　　随着中美贸易战序幕的开启，美方的手段层出不穷，日益多样化，包括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国是遭遇美国双反调查最多的国家，仅2017年上半年美国针对中国的双反调查立案就达11起，2018年1月又提起2起双反调查。2017年11月，美国针对中国进口普通合金铝板的双反调查的对象包括了在第三国进行加工的普通合金铝板。

　　232调查。2017年4月，美国商务部罕见动用了《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对进口钢铁和进口铝启动调查，分析该进口对国家安全的影响。2018年1月，美国商务部完成调查并向特朗普总统提交报告，认为进口钢铁和铝冲击了美国的有关生产企业，建议对进口钢铁和进口铝采取关税或配额措施。特朗普总统于3月8日宣布，美国将对进口钢铁征收25%的关税，对进口铝产品征收10%的关税。关税措施在15天后正式生效。

　　除此之外，还包括337调查、201调查、301调查等。

　　4.2 中美贸易战的危害

　　中美贸易战一旦全面爆发，势必给两国带来损失。

　　4.2.1 对中国的危害

　　对中国而言，尽管近年来发展迅速，但从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完善程度、国际影响力等方面而言，中美仍存在着不小差距，与美国开展全面贸易战，中方必然会有较大损失。

　　从贸易利益来看，中国产品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度远高于美国对华贸易依赖度。尽管美国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控制等加大了美中货物贸易逆差，但美中贸易巨额逆差是不争的事实。如果贸易战打响，对美贸易持续受阻会影响我国出口企业的利益，降低出口企业的发展能力，影响就业，进而制约国内经济发展。

　　从创新利益来讲，美国征税领域主要集中在中国具有行业竞争力和发展前景好的高科技产品，加之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在美国投资进行限制，这无疑会影响到中国企业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开展创新。

　　从投资利益来讲，由于美国的经济地位和美元在全球的霸权地位，中美贸易战爆发可能导致在华资本投资预期收益下降，造成资本外流，同时外商也会出于风险考虑减少对华投资，从而降低了外资技术外溢效应和对中国经济增长驱动效应。

　　从开放利益来讲，中美贸易战有可能引发其他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对华贸易保护。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可能会追随美国采取类似的政策，如印度、阿根廷、土耳其等新兴国家也可能采取相应措施。从近年趋势来看，我国与欧盟、印度等贸易对象贸易摩擦持续不断，一旦中美贸易战全面爆发，这些国家可能对我国进行利益要挟。如果中美贸易战演化为整个西方的集体行动，同时带动与我国处于工业化竞争态势的新兴经济体大国行动，无疑会对中国开放经济发展环境造成冲击。因为不仅中国产品对发达国家市场依赖程度比较大，而且很多在高科技领域取得的成就都是向发达国家不断学习的结果。

　　4.2.2 对美国的危害

　　对美国而言，中美贸易战的损害是眼前的，立即就会产生损害。原因是中国针对的这些产品当中，制造业就业人口是特朗普的主要选民，对特朗普的政治意图中期选举获胜可能会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

　　对于特朗普来说，他在竞选的过程当中有了很多过高的承诺。比如指责中国、德国等一些顺差比较大的国家是汇率操纵国，在贸易当中获得了过多的利益，并且声称要对这些国家征收45%的关税。在他上任这一年多来，真正能够落地的只有减税法案。在其他方面比如减顺差方面并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同时，如中美贸易战全面升级，将势必增加美国民众生活成本，推升美国通胀，制约消费，给全球经济复苏带来阴影。从中美的贸易结构看，中国贸易逆差较大的行业主要是大豆等农产品、汽车飞机等运输设备、矿产品等。

　　美国贸易保护虽然会对其国内部分行业形成利好，但将损害多数行业及消费者的利益。若美国对中国制造进一步提高关税实际上将等同于向消费者征税，势必增加美国民众的生活成本，推升美国通胀，制约美国消费。

　　第五章 中国应对中美贸易战的对策

　　贸易战没有赢家，在中方损失可能大于美国的情况下，中方除了反制措施外，还应尽最大努力防止中美贸易战的全面爆发，积极对美沟通，以灵活措施博取实际利益。

　　5.1 注重对美民众的宣传，缓和主流民意对中美贸易的误解

　　通过各种媒体渠道、人员交流渠道、会议渠道传播或以白皮书方式厘清美中贸易逆差的实质：即在全球供应链一体化的大环境下，中国在中美双边贸易失衡中的贡献被严重夸大了，中美贸易中，80%的美国自华进口是替代了来自其他经济体的进口。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承接了来自发达国家和东亚新兴经济体（如亚洲四小龙）的产业转移，这些产业生产环节转移到中国，产品原产地发生改变，使得原来的诸如美日贸易逆差、美韩贸易逆差转变成为美中贸易逆差。同时在中国对美出口前十强企业都是外资企业，其中美资企业也占一席之地，贸易的核心利益并不在中国。落实到企业层面，中美贸易顺差相当部分是被跨国公司赚走了，这是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分工和全球发展战略的结果，而不是中国给美国造成了产业冲击和失业。反之，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大量质优价廉的中间投入品，供给美国企业生产，可降低美国生产成本，提升产品竞争力、促进企业发展，进而扩大雇佣人数，也可使美国民众不受成本推进型通货膨胀的影响；同时扩大中国企业对美投资更可以扩大美国就业，增加税收和人民收入。因此，不要将中美贸易与民众利益对立起来。

　　5.2 加强与美精英阶层的沟通

　　通过高层沟通、智库合作、学术交流、企业合作等渠道向美国精英阶层传播中方观点，即开放的中国希望与美国加大合作。我国对美国产品、资本、技术需求强烈，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拥有超过4亿中产阶级消费群体的中国，在扩大对美进口方面，中国人均消费品进口大约为36美元，远低于美国996美元的水平，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同时美国也可以放宽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增加中方对美进口；中国对美国在金融、会计、教育、旅游等服务贸易领域的需求强烈，每年中美服务贸易逆差现象正说明了这一点，而这恰恰是美方统计美中贸易逆差没有包括的。中美在服务贸易、技术、产业领域中有很多的合作空间，中国的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不是排斥美国的，是愿意与美国共同发展的。

　　5.3 合理引导国内媒体宣传，防止政策被媒体“绑架”

　　随着中美贸易冲突升级，中国国内媒体出现了一些非理性声音，主张全面贸易战，不能客观看待中美贸易战利弊的观点不在少数，甚至有些媒体片面夸大中美冲突，将分歧扩大化，断章取义进行不实报道，产生了不良的舆论导向，这种导向容易激化中美矛盾，尤其是民间矛盾。因此，我们需要引导国内媒体宣传，使之客观中立阐述经贸问题，发出理性声音。

　　5.4 加快“一带一路”建设，开拓发展中国家市场

　　开辟新的海外市场有利于改变我国出口产品过度集中在美、欧等发达国家的现状。广大发展中国家是不可忽视的市场，这些国家与中国存在着产业互补性，我国应通过双边和多边贸易谈判，降低贸易壁垒，提高互信，推动相互经贸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也有利于缓解中美经贸摩擦。中国对于相关国家的产业转移将为我国企业提供新的出口平台，也可产生贸易转移效应，将中国对美出口转化成其他国家对美出口，缩小中美贸易顺差。

　　5.5 采取务实经贸合作措施，拓展对美合作空间

　　进一步扩大对美进口，应扩大中国在金融、医疗卫生、技术研发、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加强与美国在服务业领域合作，提升我国相关服务业发展水平和竞争力。此外可尝试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吸引美国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发挥其在技术、管理以及专业服务方面的优势，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共同受益。

　　5.6 改善国内营商环境，保护知识产权

　　在国内营商环境改善方面，我们仍需不断努力，促进市场环境更加公平，完善市场机制与法律监管。此外，还应注重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体系，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执行力度。

　　5.7 在WTO框架协议内对美国提起群体诉讼

　　美中贸易逆差来自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转移战略。美国对我国实施贸易保护，以减少贸易逆差为目的的产业制裁必然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包括东盟、俄罗斯、巴西等对华原料输出国，也涉及欧盟、韩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在华布局的跨国公司，甚至涉及美国在华跨国公司利益。因此，需要利用PTO框架进行贸易权益的合理诉讼要求，一定程度上会得到这些国家的支持。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6.1 结论

　　美国借由中美货物贸易逆差巨大，挑起中美双边贸易摩擦，并据此在投资、贸易等领域出台一些措施，对中国施压，随即中国反制，中美贸易摩擦演变为贸易战。中美贸易战的现实起因真的是巨大的货物贸易逆差吗？事实证明，中美贸易战的起因不是中美货物贸易逆差巨大，巨大的货物贸易逆差形成的原因一方面，主要是美国对华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控制，而不是中国“奖出限入”的经贸政策；另一方面，美中货物贸易逆差由于原产地原则和其它统计方法上的重大缺陷而虚高，其无法切实反映两国之间的贸易收支和竞争力。

　　总之，中美贸易战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的迅速发展的中国与老牌守成帝国的美国之间的全球战略竞争在经贸领域的反映，其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结构性，仅货物贸易逆差减少是无法解决的。为此，我国要沉重冷静，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应对中美贸易战，以期实现进一步的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国家的发展。

　　6.2 展望

　　总之，本文对中美贸易战的原因、现状及趋势和中国对策进行了分析，但研究仍很浅薄，存在不小问题，如中美贸易战的现状分析部分，由于缺乏第一手的资料，导致分析不够深入，再比如对策部分，提出的对策是否可行和有效还有待验证。

**这篇文章是中美贸易战最客观、理性的分析**

中国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中美冲突将会越来越多，危机随时可能爆发，如何管理危机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巨大挑战；中国对自己的对外经济政策作出调整，已刻不容缓。

　　中美贸易战已经打响。这是一场持久战，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休战，更不知什么时候可以翻过旧的一页打开新的一页，我们不得不对一些新老问题做进一步的思考。

　　1

　　以战止战，有理有利有节，从容应对

　　特朗普的谈判策略是所谓的“疯人战略”，极限恫吓，先是漫天要价，然后利用对手的心理弱点给予一点让步，以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结果。

　　美国政府在第一轮中美贸易谈判中提出的要求是一份无理的最后通牒，中国当然不能接受。面对特朗普的挑战，中国没有退路，只能依照 WTO 规则进行报复。

　　其实，其他国家对美国也是这样做的。贸易战是否会进一步升级，不在中国的控制范围内。特朗普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中国的让步并不能保证特朗普不会得寸进尺。

　　中国应该坚持市场化地处理中美贸易的失衡，如降低关税、进一步开放中国的服务业市场（电信、医疗、教育和养老等服务业市场），特别是金融服务业；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采用提供购物清单的方法达成妥协，是一种非市场的解决办法，对资源配置可能产生会消极影响。

　　有人主张在关税之外的其他领域、如投资领域，对美国进行报复。我以为中国的报复是不得已的、被动的，不应该主动挑起在新领域的冲突。在华美资企业的合法权利必须得到保护。抛售美国国债也是一个坏主意，它对美国造成不了什么伤害，却可能把中国自己置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美国每次公布加征关税清单时，都会用数月时间征求各方意见。中国也应该这样做。中国在表明一定会报复的立场之后，不必急于采取行动。应该充分征求公众、特别是企业的意见。中国不用急于确定报复清单，也没有必要急于实施报复计划。

　　美国的清单针对的是从中国产业政策、特别是从“中国制造 2025 ”受益的产品。中国的反制清单则主要针对美对华出口量较大的产品。

　　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在被美国加征关税的 500 亿美元中国出口产品中，73% 是供美国企业使用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加征关税必然导致美国企业竞争力的下降。而这些产品中的70% 是在华外资企业生产的，加征关税必然导致这些企业包括美国企业利润的下降。美国想通过对中国出口产品加征关税打痛中国，到头来，被打痛可能是美国自己。鹿死谁手还未可知。中国完全可以以从容不迫的态度应对中美贸易战。

　　此外，正如宁南山先生所分析的，中国是有能力对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和汽车产业予以重击的。我们可以引而不发，但要让特郎普明白：如果他继续胡闹，中国必然会报复。

　　2

　　积极维护现存国际秩序

　　在二战后的几十年中，现存世界秩序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外部环境。中国应该继续为维护现有国际秩序而努力。具体说，中国应该继续维护以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贸易组织（WTO）为支柱的国际组织的权威。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对比的变化，会导致对国际组织和国际行为准则进行调整的要求，但这种调整必须在现有国际法的框架下进行。

　　从法律地位上说，WTO 是国际经贸领域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最重要的多边规则体系，其权威必须得到尊重。WTO 的缺陷应该通过新的谈判加以弥补，而不能在完成新一轮 WTO 谈判之前，用单边、双边甚至地区性的解决办法代替 WTO 的解决办法，否则，国际贸易将处于失序状态，危害世界经济发展甚至危害世界和平。

　　特朗普的单边主义正在遭到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反对，中国可以联合欧洲、日韩印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倡导恢复乌拉圭回合以来限于停顿状态 WTO 谈判。应该看到，慑于美国的淫威，欧洲和日本也可能会首鼠两端，甚至帮助美国打击中国。

　　中美贸易争端是通过中美双边谈判解决，还是通过 WTO 磋商和争端解决机构（ DSB ）解决，是个值得认真考虑的重要问题。中方采取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尽管中美双方进入了 WTO 争端解决程序，但主战场显然仍在北京和华盛顿。

　　实事求是地讲，日内瓦磋商的重要性无法同中美双边谈判的作用相比。现在，中美之间的双边谈判已告失败，贸易战已经打响。中美是否会重开谈判不得而知。但是，中美贸易代表团进行的双边谈判，和通过 WTO 争端解决机制进行的谈判如何协调，如何让 WTO 争端解决机制在中美谈判中发挥作用，对于维护 WTO 的权威有着重要意义。

　　目前中美贸易战已经开打，肇事者无疑是美国。美国对中国实施加征关税的措施，中国必须回击。而且，面对类似的形势，其他国家（如加拿大）也已对美国进行了报复。即便如此，在已经实施报复措施之后，中国应该坚持走完通过 WTO 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的全程。对于这类法律问题，经济学家难以置喙，希望中国的国际贸易法专家能指点迷津。

　　3

　　坚持全方位的开放方针

　　尽管 301 调查报告的结论完全站不住脚，但中国对 WTO 承诺的履行也并非无可挑剔，301 报告提出的问题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中国在消减关税等方面确实超额完成了 2001 年作出的 WTO 承诺。但在贸易补贴方面，有些做法即便未违背 WTO 的文字规定，也与 WTO 的精神不符。

　　例如， 由于各国税收制度不同，为了使出口商品在税率较低的海外市场免受不利影响，出口国可对出口商品实施退税。WTO 规则允许对出口商品实施退税，但是中国往往把改变退税率作为刺激出口的政策手段。在这种情况下，退税政策就违背了 WTO 的初衷。此外，在一些地区，有违 WTO 规则补贴出口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中国在根据 WTO 承诺开放金融服务业和加强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也有不小的改善空间。

　　例如，中国在 2001 年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 WTO 议定书》的附件 9《中华人民共和国服务贸易具体承诺减让表》中承诺： 加入 WTO 后五年内，将取消外汇业务的“所有地域限制”；“允许外国金融机构向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取消限制所有权、经营及外国金融机构法律形式的任何非审慎性措施，包括关于内部分支机构和营业许可的措施”。此外，中国还承诺在满足一定条件后，“外国金融机构可以在中国设立外国独资银行或外国独资财务公司”。

　　中国政府在 2018 年 4 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提出进一步开放金融服务业，与中国当年的 WTO 承诺不无关系。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中国也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

　　6 月 29 日，国家发改委、商务部联合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大幅扩大服务业开放、基本放开制造业、放宽农业和能源资源领域准入。相信这是有关部门在对国家经济安全做了充分考虑之后作出的、同中美贸易战进程无关的决定。6 月 29 日的“负面清单”招致了一些非议。

　　我以为，中国政府在公布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举措之前，应该举行更多、更广泛的公众听证会，听取公众、特别是有关企业的意见。中国政府的一些举措恐怕还要有立法机构的批准。在这方面，美国政府的许多做法值得我们借鉴。

　　▲国家治理现代化：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出席参议院听证会

　　4

　　支持企业自主创新

　　301 调查报告对中国的产业政策大加挞伐。

　　301 调查报告认为，中国的目标是使自己在技术领域、特别是在先进技术领域，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上分别取得支配地位和领先地位。为此，中国试图减少对外国技术的依赖、提升在价值链中的位置、实现从廉价生产者到全球科技创新大国的转变。应该承认，301 报告的上述概括是比较准确的。

　　中国目前的产业政策有两个关键环节：

　　⒈确定“战略性新兴产业”名录；

　　⒉政府为选定产业提供各种形式的帮助。

　　在确定目标之后，从政府角度来看，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支持企业实现上述产业或技术政策目标。政府支持企业实现这些目标的措施和政策则包括补贴、税收优惠、政府采购、技术研发、奖励、标准法规的建设、体制机制创新等。

　　以光伏产业为例，最开始政府的支持包括：对并网光伏发电项目按总投资的 50% 给予补助；对于光伏发电关键技术产业化和基础能力建设项目，主要通过贴息和补助的方式给予支持。政府对电动车产业的支持也是如此。

　　2015 年，中央和地方为电动车产业提供了 300 多亿元的补贴，只要车辆达到规定的技术标准，除了中央财政补贴，一般还能享受与中央按 1：1 发放的地方补贴。据称，生产一辆纯电动客车，“国补”加上“地补”以及其他优惠政策，最高可以享受 100 万元补贴。

　　在光伏和电动车领域，政府通过补贴等形式予以支持是国际通行的惯例。

　　日本政府在上世纪 70 年代就开始扶植新能源产业。日本经济产业省在 1993 年实施“新阳光工程”，布局建立日本本土的太阳能光伏产业和太阳能市场。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日本政府一方面通过政府资助推动太阳能电池制造技术研发，另一方面为光伏发电用户提供补贴。德国则实施“固定上网电价”政策，电网公司必须全额收购光伏发电的上网电量。

　　对于电动车，日本政府为购车者提供补贴，补贴数量以不超过因购买电动车而多付出的购车款的 50% 为限。 欧洲国家则在对购买电动车实行扣税、免税的同时，作为一种逆向激励，对普通车辆加征碳税。在比利时，购买电动车可得到最高达 9190 欧元的个人所得税抵扣。

　　我们的问题是：

　　⒈如何确定技术发展目标（不是给予优惠的产业目标）？

　　⒉政府应该在技术发展过程中起到何种作用？

　　对传统产业政策批评最多的是“挑选胜者”（ picking winner ）。政府不如企业聪明，政府往往选错“潜力股”。此话有道理。但是：

　　⒈中国所提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目录是在广泛吸收企业、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提出的；

　　⒉更重要的是，名录是指导性的而不是指令性的，企业大可以走自己的路。

　　政府对某种技术研发和产品市场的支持，是世界通行的做法。特别是高技术产品研发的周期长、初始投入大，没有政府的支持很难成功。因而，在这个问题上，301 报告并未做更多的文章。

　　301 报告对中国政府支持企业实现技术赶超的批评，主要集中在技术获取方式上。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对国内产品研发、生产、销售进行补贴是 WTO 所允许的，但这种补贴不能违反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的原则。换言之，如果这种补贴给了中国企业就必须给在华外国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长期的补贴政策，导致光伏业产能过剩、劣质产品占据一定市场份额、滋生金融风险和地方政府寻租等问题。2018 年 5 月 31 日发布的“光伏新政”（《关于 2018 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大幅收缩有补贴的光伏新增装机总量，同时度电补贴每千瓦时下调 5 分钱，就是对过去政策的纠偏。

　　光伏和电动车的兴衰告诉我们，“产业”政策的失败，同地方政府过度介入和有关部门管理能力低下有关。地方政府为出政绩盲目吸引光伏企业投资，是造成光伏行业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许多汽车厂家大肆“骗补”，则同缺乏完善的监管措施有关。骗补是刑事犯罪行为。骗补大行其道，说明了企业家的堕落。产业政策或“与技术相关”的产业政策能否成功，是以一系列制度条件为前提的。应该承认，如果企业经济活动受到地方政府过多干预，如果没有风清气正的政治和文化生态，有产业政策或技术政策，可能真的还不如没有产业政策或技术政策。

　　301 调查报告充分反映了美国朝野对中国向高技术领域进军的担忧与敌视。

　　在中美经济竞争中，美国的优势在高技术领域。而中国也深知赶超美国的关键是高科技。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在高科技领域，美国将尽一切可能通过各种办法保持对中国领先 10 年到20 年的优势。为了防止中国的技术赶超，美国“宁可自伤 800 ，也要杀敌 1000 ”。

　　美国的 301 调查报告和特朗普 6 月18 日的讲话，已经清楚的表明了美国的这一立场。特朗普政府开始谈论对中国学者和学生的限制，这使我们嗅到麦卡锡主义的气味。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路风曾经指出：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产生了引进技术的强烈需求，……对技术引进的偏重在实践中逐渐发展成为对自主开发的替代、并产生了可以依靠引进技术和外资发展中国经济的幻觉，甚至出现了排斥自主技术创新的倾向。

　　本来，随着中国自身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中外技术差距的缩小，外国企业对自身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就会越来越紧。现在，再加上美国政府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政策转变，中国希望通过市场换技术、逆向工程、购买、海外并购等等方式获取外国核心技术，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缩小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自主创新”成为中国企业唯一可靠的选择。

　　正如路风教授所说：

　　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是，中国已经具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知识生产基础结构以及丰富的科技人力资源……中国走向自主创新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和政策转变，其实质就是要使科学技术进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源泉，同时把本土技术能力的发展看作是提供中国经济国际竞争力的主要途径。

　　自主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和个人。但由于初始投入大、投资风险高，外国垄断企业往往也会合力打压，国家对自主创新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政府可以且应该通过适度的补贴、减税、信贷优惠、事后奖励、行政便利、基础设施提供等方式，对企业和个人的自主创新予以支持。当然，政府在基础研究和教育的投入更自不待言。

　　中国应该感谢特朗普、纳瓦罗和莱特希泽，他们对中国实行技术封锁只能迫使中国放弃幻想，更加心无旁骛地走向自主创新的道路。

　　5

　　重新审视“走出去”战略

　　走出去”是中国近几年大肆宣传的“战略”。这一战略已经引起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高度警觉。

　　301 调查报告认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在三个方面损害了美国的利益。

　　⒈中国试图通过并购和投资实现产业升级，损害了美国企业的竞争力。由于中国企业得到政府补贴，以及拥有数千亿美元的各种基金的支持，美国高技术企业无法在全球市场上同中国企业开展公平竞争。由于市场份额的丢失，美国企业的研发可能不得不转向其他利润和发展潜力较低的领域，进而丧失长期竞争力。

　　⒉中国企业比美国并购目标企业技术落后，根本无法给美国带来一般直接投资所能带来的技术溢出效益，因而将破坏美国企业的持续创新能力。

　　⒊中国的海外并购人为提高了潜在并购标的物的价格，造成了整个知识产权并购市场的价格扭曲。

　　正如日本经济学家关志雄所指出的，为了阻止中国企业为获得先进技术而开展的并购等对美直接投资，美国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越发严格。

　　值得提出的是，只要与“安全”挂钩，WTO 的许多规则就可以被搁置一旁。根据《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 FINSA ），美国政府下属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CFIUS ）负责监管对美直接投资。CFIUS 有权依法审查海外企业以“控制”为目的的企业并购（ M&A ），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安全风险。如果判定美国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CFIUS 就会要求外国投资人改变投资内容或放弃美国国内资产。

　　2017 年 11 月，美国参众两院联合递交了以增强 CFIUS 监管权限为目的的《外商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 FIRRMA ）；其中，不仅对以往的部分习惯作了明文化规定，还决定将投资审查范围扩大到一些明显针对中国企业的领域。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以资金为基础的在海外并购战略必然受阻，并且代价越来越高。中国应该给这种“走出去”战略降温，企业“走出去”应该建立在商业考虑的基础之上，依靠商业手段加以实施；除非特殊情况，政府不应予以干预。

　　除了获取技术的动机，输出过剩产能也是许多企业走出去的动机。这种输出可能存在两个问题：

　　⒈整个经济和产能过剩企业的结构调整被延后；

　　⒉接受投资的东道国国根本没有能力偿还对中国的债务。为了避免这两个结果、特别是后者，企业负责人和相关决策者必须准备承担被追责的后果。

　　因此，近年来方兴未艾的“走出去”应该调整。中国企业旨在获取高新技术的“走出去”，正受到美国火力全开的阻击；“走出去”获取先进技术的道路肯定会越走越窄。中国企业旨在输出过剩产能的“走出去”，也将会日益受到东道国政局不稳、无法偿还债务等问题的困扰。

　　企业“走出去”必须建立在商业考虑而不是政治考虑的基础之上。中国过去的对外援助几乎都以“既失去了金钱，又失去了朋友”而告终。这一惨痛经验教训不应忘记。

　　中国自身有着庞大的国内市场，开拓国内市场应该是中国企业的主攻方向，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其他政策，应该鼓励企业在扩大国内投资和调整产品结构，在适应或创造国内需求上多下功夫。

　　6

　　避免被美国敲诈勒索

　　多年来美国利用美元的霸权地位和世界各国企业对美国市场的依赖，挥舞罚款的大棒，以维护法律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

　　中企既然在国外经营就应该严格遵守外国的法律；但是，我们也不应该幼稚到相信只要我们遵守（主观上遵守）美国的法律、法规就不会遭遇到被敲诈勒索的厄运。今后美国将更经常使用禁运之类的“大棒”打击中国企业。

　　由于美国的“长臂管辖”，即无论发生地在何处，任何人只要满足了“最小联系”（只要和美国发生了任何联系，哪怕仅仅是电话、邮件或银行转账），美国都具有管辖权（判罪），中国所有企业都会面临中兴通讯式的危险。

　　2017 年 6 月 30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说：

　　中方一贯反对在安理会框架外实施单边制裁，尤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根据其国内法对中方实体或个人实施‘长臂管辖’；

　　对于中国企业和个人，如果有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为，一经查实我们会根据自己的国内法依法依规进行查处。

　　从外交部发言人的立场来看，美国对中兴的处罚并无合法性。但在实践中，由于缺乏反制能力，中国很难使“美方立即纠正有关错误做法”。今后，美国可能会把中资产企业当作人质，绑架中国的外交政策。

　　如果美国对某个国家（如伊朗）实行禁运，而中国的外交政策不支持这种禁运，中国企业怎么办？对于这种可能性，中国必须准备好预案，颁布相应的法律，以减少自身所受到的伤害。“不付赎金”应该成为中国的一条基本原则。同时，我们要认真研究中国海外资产（包括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做好预案。

　　7

　　做好中国自己的事

　　中国最终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最可靠保证是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并且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经济体系，可以依靠庞大的国内市场最大限度地实现规模经济。

　　2006 年，中国出口占 GDP 的比重为38.6%，以后逐年下降，但 2016 年这一比重仍高达 20.2% 。与此相对照，美国出口占 GDP 的比重为13% 左右。中国出口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为 14% 左右。

　　2017 年，中国对美国出口总额5056 亿美元、对美国贸易顺差近 3750 亿美元（美方数字）。尽管在最近几年有所改善，在大国中，中国显然依然是对外部需求、特别是对美国需求依赖度最高的国家。

　　中国的这种经济结构存在三个问题：

　　⒈资源跨时、跨境配置的扭曲。中国严重依赖对外贸易的这种经济结构，是长期执行出口导向政策的结果。而出口导向政策意味着，各种形式的出口补贴措施的使用和汇率的低估，而这些又意味着价格扭曲的存在。

　　价格扭曲必然导致资源错配。深度参与全球分工、发挥比较优势所导致的国民福利增长，可能早就开始被贸易条件恶化、环境污染、资源枯竭、面对外部冲击的脆弱性所导致的国民福利损失所抵消。中国早就有必要对经济的外向程度做些回调。

　　⒉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攻城略地，已经引起其他国家的恐 慌和敌视。在 500 多种主要工业产品当中，中国有将近一半的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许多竞争对手不得不接受日益缩减的市场份额，有些对手则陷于倒闭的境地。德国、美国的太阳能板生产商被横扫就是一例。中国不断占领海外市场的局面，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接受的，因而也是不可持续的。

　　⒊由于美国国内政治气氛的变化，尽管在经济上对美国总体有利，中国已经无法继续维持对美国的大量贸易顺差。美国是中国出口的最大吸收国。减少对美的贸易顺差，意味着中国必须相应减少对东亚国家的贸易逆差。对美贸易格局的调整，也意味着中国必须降低经济的对外依存度。

　　为了进一步降低中国的出口依存度，中国必须彻底放弃出口导向政策，转而实行中性的贸易政策。为此，中国必须尽可能减少出口补贴、避免使用出口退税作为刺激出口的手段调节、让人民币汇率发挥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作用。

　　长期以来，大力吸引外资、以市场换技术，是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另一个重要特征。中国是一个高储蓄国家，中国不缺乏资本。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引进国外技术。通过提供优惠来吸引外资的政策存在一系列问题：

　　首先，中国并没有有效地把资本流入转化为贸易逆差，从而形成了一种不合理的国际收支结构和国际投资头寸结构。这种结构的不合理性就体现为，中国虽然拥有 2 万亿美元左右的海外净资产，但在过去十几年中，中国的投资收入基本是逆差。

　　其次，市场换技术的策略已经证明是一种比较失败的策略。随着中国经济竞争的日益激化，通过引进外资提高中国技术水平的可能性越来越低。

　　再次，在某些时期和地区，由于地方政府对外资实行的优惠政策，本地民企受到挤压。因而，中国需要把过去的引资政策改为负面清单管理。在允许外资投资的领域，如果外资希望进入，我们欢迎，但没有优惠政策。为了顺利执行中性的外资政策，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标准也应该作出相应调整。当然，中国应该继续欢迎外资，因为外资的进入会增加对中资企业的竞争压力，有助于改善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

　　中国在过去 20 多年中所积累的 3 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安全性，也值得注意。中国早已跌入美元陷阱。有人说中国的外汇储备是中国对付美国的武器，但事实是，中国的外汇储备更是美国对付中国的武器。这就是凯恩斯所说的：

　　如果你欠银行 100 英镑，你有麻烦；但如果你欠银行 100 万英镑，银行有麻烦。

　　现在美国欠了中国 3 万亿美元，有麻烦的是谁是最清楚不过的事情。除非能以某种方法确保外汇储备的安全，中国应该逐步、有序地、润物细无声地通过经常项目或资本项目逆差，用掉其中的大部分，而仅维持最低限度的美元外汇储备。

　　既然中国已经不再处于“战略机遇期”，中国对跨境资本流动可能造成的冲击就更需要保持更高的警惕性。对于资本项目，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不应该再进一步推出任何重要的自由化措施。

　　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在改革开放初期主要表现为中国按所谓的“雁行模式”参与国际分工，现在则是越来越多地深度参加到全球生产网络的价值链，中兴事件暴露了参加这种分工的脆弱性。但是，脱离全球价值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冲击也是极为巨大的。

　　如何平衡各种关系、建立威慑平衡（类似核武器的恐 怖平衡），使美国不敢恣意妄为？

　　如何既不脱离价值链又不会因价值链受到破坏而丧生生存能力？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仔细考虑的问题。中国全球生产网络企业应该积极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同行一起努力，使全球生产网络、价值链免遭破坏。 同时，中国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掌握核心技术，以避免中兴的尴尬。

　　8

　　尽量减少中美双方的误解

　　世界历史上的很多冲突甚至战争是误会引起的。中国应该努力减少美国对中国意图的误解。从 301 调查报告就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的意图、战略、政策存在许多误解。

　　基本上，美国过高估计了中国的实力和潜力。而中国自己的宣传则加强了美国的误解。虽然中国已经被美国定位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中国对中美关系的改善不应抱有更多的幻想；但无论在地缘政治领域还是在国内政治、经济体制改革领域，中国还有很大政策调整的空间。中国应该继续坚持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战略方针，尽量稳定中美关系，避免使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总之，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没有改变，但战略机遇期已经离去。在继续坚持和平与发展时代看法的同时，应该看到中国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中国和美国日益走上竞争的道路，中美冲突将会越来越多，危机随时可能爆发，如何管理危机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巨大挑战。中美贸易冲突将会长期化和常态化。为了使中国能够在未来的几十年间继续保持平稳发展，为建立人类自由、民主、平等和繁荣的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中国对自己的对外经济政策作出调整，已刻不容缓